

一线城市活力怎么办？

■ 薛涌（旅美学者）

这个问题看似荒唐。明摆着：一线城市的“蚁族”早就人满为患，怎么分流还会有问题呢？

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类一线城市，因为资讯丰富、人才集中、文化发达、在全球化中与国际接轨密切，在发展上自有其独到之优势。一些制造业，设在二三线城市也许可以降低成本，更有竞争优势。但是，在高科技、金融、信息、服务业等主宰经济的“神经系统”的行业，离开一线城市则很难创出一流的水准来。

年轻人还没有成功时是“蚁族”，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。美国大学生毕业后奋斗，在纽约住地下室、和老鼠同屋的说法，虽然有些夸张，但也是多少代人之间的传奇。不过，这种落魄，和创造是同步

的。许多高科技产业，就是在发明者简陋的车房里起家的。等这些人功成名就、有钱住得起豪宅时，对社会而言反而没有创造力甚至停止创造了。

你研究一下那些成功人士，他们最有创造力的时期，往往就是最穷困落魄的时期。50%的年轻想离开的白领中人才济济，只是我们现在还看不出他们中谁是领导未来的人而已。如果他们“退居二线”，他们就丧失了应有的成功机会，我们的社会自然也丧失了从他们的创造中所应该获得的利益。

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要保持活力，就应该是年轻人创业的地方，而不是功成名就者聚居的寄生城市。可惜，在美国著名咨询公司美世公司发布的《2009年全球生活

成本》的城市排名中，北京位居全球第9，上海第11，这种地位显然是被高昂的房价所推上去的，而中国的人均GDP也才排在世界第98位。这就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很难在生活费用如此高的大城市生存。如果这些真正的创造阶层丧失了立足点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的竞争力就会跟着下跌。

7月28日，北京的一些媒体又报道说，北京市住保办27日透露，公租房操作细则正在制定当中，农民工、毕业大学生等非京籍申请人，暂不能申请公租房。这种做法很快在网络上引发批评。应该说，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。如果像大学毕业生这类年轻人，都不能在大城市中立足，所谓的城市活力又从哪里来？

“逃离”就能奔向幸福吗

■ 杨耕身（资深媒体评论员）

我不知道在多年后，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个年代曾经出现的两个现象：一是以长三角、珠三角为重点的区域一度出现的用工荒现象，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“逃离北上广”现象。前者以农民工为主体，后者则以受过高等教育、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为主体的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流动的时代，但是为什么，他们为了寻梦而涌向城市，最终却不得不黯然地选择逃离？能够读懂这一点，也就读懂了这个时代的真实与悲情。

如果“逃离”是一种正常流动现象或良性淘汰机制，那么为什么被挤出的总是外地人？如果这些“逃离北上广”者真的是二、三线城市的福音，那么为什么不是源于这些城市的真诚召唤与优厚待遇，

而是一种被动的收受？更重要的是，在一些资源、机会、公共服务完全不能与大城市同日而语的二、三线城市，这些年轻人真的能够逃向幸福与美好吗？恰恰对此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指出：回到家乡，由于父母无权无势，更是死路一条。在一个故乡早已沦陷的时代，那些逃离了一线城市的人们，又将如何逃离家乡的现实积弊？

假如那些逃离者真的是出于一种自主的理性选择，那么我将认同那些专家们的欣悦。但是对这样一个族群而言，“逃离”已根本不是一种选择，因为除此之外，他们别无选择。一份来自网络的统计数据显示，有54.7%的80后选择“逃离北上广”，其最直接原因是由于一线城市飞涨

的房价；31%的“逃离者”则认为由于户籍制度的束缚，在一线城市存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的现象。

梦想总是很丰满，现实总是很骨感。不容否认，经济发展的失衡和各种资源过度向一线城市集中，仍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巨大优势。在起初，人们正是因此而蜂拥而至。然而，这些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的一线城市，显然远没有建立起一种公平的、一视同仁的人才竞争机制与制度安排。比如房价畸高的现实性不公，户籍以及附着于其之上的种种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平等。在今天，人们正因此而逃离。

这只能是一次悲情的逃离，很难称得上理性的回归。对幸福生活的拥有与追求，从来不可能以“逃离”的方式抵达。